

目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20 世纪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述略	005
一、20 世纪初年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005
二、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012
三、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021
四、“文革”结束后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027
第二章 人物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059
一、关于人物研究的价值问题	060
二、关于人物研究的方法问题	065
三、关于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	087
第三章 中国古代人物研究中的论辩	112
一、孔 子	112
二、秦始皇	129
三、王 莽	137
四、曹 操	148
	001

五、武则天	160
六、王安石	169
七、岳 飞	176
八、海 瑞	187
九、“清官”	191
第四章 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中的论辩	220
一、林则徐	220
二、李秀成	228
三、曾国藩	240
四、李鸿章	259
五、慈禧太后	273
六、袁世凯	279
七、孙中山	291
第五章 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中的论辩	314
一、陈独秀	314
二、李大钊	332
三、蒋介石	340
四、张学良	353
结 语	375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79

<u>后 记</u>	412
<u>编辑后记</u>	413

绪 论

历史人物研究,自古以来就是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晚清以降,西学东渐,西方各种资产阶级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先后在中国得到传播,对学术界带来了深刻的革命。就历史人物研究而言,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认识和评价。人们纷纷著书立说,竞相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历史人物研究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对历史人物研究的关注,并不仅限于史学界。但在这方面展开较为广泛的讨论,主要是在史学界。本书的研究和考察,主要以中国大陆史学界在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中发生的论辩为主要对象。

20 世纪的百年中,历史人物研究一直绵延不绝,各种争鸣和讨论不断出现。我们认为,百年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的历史变迁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第一个重要时期是 20 世纪初年。由于受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兴起,历史人物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这一时期的人物研究非常重视结合社会现实,重视对新思想、新方法的运用,富于生机和活力。这时期论辩涉及的主要历史人物有中国古代变革社会、反抗侵略的英雄人物、先秦诸子、太平天国人物等。第二个重要时期是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及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展对这一时期的人物研究产生了特别的影响。论辩涉及的历史人物更为广泛,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新史学出现明显分化,跟现实政治的结合更加密切,成为这时期人物研究论辩最显著的特点。第三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 17 年。随着马克思主义

史学迅速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科学文化领域“双百”方针的实施,这时期史学界在50年代初、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60年代中期出现了三次人物研究和论辩的高潮,人物研究和论辩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两个时期。这时期人物研究论辩的显著特点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要求全面、重新认识和评价各种历史人物,试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第四个重要时期是“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这是20世纪人物研究论辩最繁荣的时期。论辩队伍大,论辩阵地多,论辩的历史人物和问题多,论辩水平高,是这时期论辩的显著特点。同时,随着历史人物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文化热”、“现代化热”的出现,人物研究的内容和视野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综观整个20世纪百年的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论辩较多、论辩水平较高、论辩成绩比较显著的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和“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两个时期。“文革”的10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正常的学术讨论被破坏,成为了百年人物论辩研究的一个空白时期。本书第一章“20世纪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述要”,对百年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的历史变迁情况做了简要考察,并概要地介绍了各时期史学界主要关注的历史人物和问题,总结了各时期论辩值得注意的一些特点,希望能使读者对百年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的总貌有宏观了解。

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的形成、变化与历史人物研究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密切相关,许多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的本身也渗透着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因此,考察历史人物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上的论辩,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在具体历史人物研究上产生的论辩及其内容。20世纪的百年中,我国史学领域先后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出现了两次意义深刻的史学革命,其中后者的影响最为深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下,伴随着一次又一次人物研究论辩高潮的兴起,人们对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也先后在50年代初、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8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几次讨论高潮。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人物研究的价值论、方

法论以及一些具体的历史人物研究理论。这些人物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本书的第二章“人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将对这些讨论情况做专门考察。

20世纪的历史人物研究论辩,最主要的内容是具体人物研究中的论辩。百年之中,史学界的讨论涉及的历史人物繁多,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农民起义领袖、游侠隐士、技艺百工和普通民众,无所不有,但是人们讨论较多的还是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和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从我们的考察和研究来看,百年之中史学界关注很多、产生了较多争论的重要政治人物和思想家实在太多。对于应该选取哪些历史人物作为恰当的个案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很难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我们最终根据本书篇幅的要求、资料挖掘的情况、对论辩情况掌握的程度、自己对历史人物重要性的认识,选取了孔子、秦始皇、王莽、曹操、武则天、岳飞、王安石、海瑞、林则徐、李秀成、曾国藩、李鸿章、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张学良等19个历史人物以及一个群类人物“清官”。还有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和思想家也受到特别关注,因另有专书论述,本书没有再行研究。对上述这些历史人物研究中发生的各种论辩,本书将按史学界比较流行的历史阶段划分观点,分别设“中国古代人物研究中的论辩”、“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中的论辩”、“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中的论辩”三章进行专门考察。

本书的考察和研究,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遵循“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原则,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阶段性的主体的学术水平和认识水平,既注重阐述被后来历史证明是科学、正确或比较科学、正确的观点,也不讳忌阐述某个特定时期主流学术思想中错误的认识。在叙述论辩过程及内容的同时,我们将尽力公允地分析先哲、今贤在认识上的灼见与偏差,反映出自己的基本思想倾向。对一些具有较大分歧的学术观点,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尊重,抱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轻易作出评论。特别是对本书涉及的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而言,由

于历史人物活动和思想的复杂性,我们对学术研究中许多有分歧的观点很难作出是非倾向性的评价,结果自然是如同读者所看到的,叙述多而评论少。

本书的研究所涉及的学术论点,主要选自百年间 130 多部著述(含论文集)、700 多篇文章,著述和文章的选择尽可能地遵循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标准。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和目前学术状况的局限,更由于我们学术阅历和学术水平的有限,20 世纪前半期论辩的资料搜集得不够充分,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有关的研究,希望读者谅解。另有不足之处,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4 年 9 月

第一章 20 世纪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述略

一、20 世纪初年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20 世纪初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迅速高涨的新时期。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完全变成“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神州大地到处笼罩着“亡国灭种”的阴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领导和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将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北洋军阀当政后,政治上投靠帝国主义,推行封建专制,在军事上大小军阀间为争权夺利混战不断,在文化上对尊孔复古情有独钟,使得中国社会乌烟瘴气,中华民国有名无实。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的先进分子又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斗争,有力地回击了封建复古逆流,将中国的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启蒙进一步推向深入。

20 世纪初年中国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启蒙的深入,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和革命。一些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先进分

子,为适应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需要,积极引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揭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帜,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应运而生。对近代中国“史界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创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英国实证主义史学。以英国实证主义史学泰斗博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为代表的西方史学著作,主张将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主体,为新史学提供了新理论、新方法,为批判、改造传统史学创造了条件。1901至1902年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正式揭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标志着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崛起。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宣称:“今日要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少无男无女,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为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除了梁启超以外,还有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虽然这些人分属于改良派和革命派,政治立场不同,但对于新史学的主张却大体相同。他们大都提倡民史,反对君史,主张史学应该以国民为本位,要将古代史学的帝王资治通鉴转变为近代史学的国民资治通鉴,把帝王为中心的史学体裁转变为以国民为中心的史学形式,展示国民文化史的演进过程,对国民文化史的各项主要内容作出专门论述,使建设国民文化史而有所凭藉。在历史观方面,都提倡进化论,反对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

在社会革命和史学革命双重作用与影响之下,20世纪初年的人物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根据形势需要,开始运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历史人物评价与研究,将人物研究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他们通过翻封建旧史的案,对一些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对传统观念发起了强烈挑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论辩。

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论辩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如何评价中国古代历史上变革社会、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英雄。

鸦片战争至戊戌时期的史学家把君臣之义以及名节观念当作人物评价标准,认为依据它们可以扭转现实政治的混乱局面。如魏源于1857年前后写成的《元史新编》竭力坚持《春秋》的褒贬思想。“论曰《春秋》书三叛人名,以惩恶而劝善,其人皆以土地归鲁,鲁史直书其事,不少讳焉。刘整、吕文焕、夏贵、刘梦炎之徒,身为将相大臣,乃亦趋降恐后,无复愧耻,不彰其恶,则贼臣接踵,岂尚有顾忌哉。”^[2]到了20世纪初年,这种人物评价的标准受到了强烈挑战,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运用社会进化论作为评判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与研究。《湖北学生界》1903年发表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提出,要调查“历史上之遗佚”,即包括“旧史诬蔑之英雄,旧史湮没之英雄,鼎革时代之实录”^[3]。这里,实际上是主张要翻封建旧史的案,要翻封建旧史所“诬蔑”和“湮没”的“英雄”的案。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一文中对这种封建正统人物史观也进行了批判,“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为充栋,徒为生民毒耳。”他对于封建史家的否认少数民族帝王和农民革命领袖以及农民部队之为正统,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他表示为匈奴冒顿、突厥颉利和陈胜、吴广、新市、平林、铜马、赤眉、窦建德、黄巢、张士诚、陈友谅、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而悲”。他认为一些人的能否获取祖(如汉高相等)帝(如宋武帝等)的徽号,就在于幸和不幸而已。他反问:窦建德的德难道就不如朱元璋之德吗?朱温的辖区难道比洪秀全的辖区广吗?隋文帝杨坚难道比西夏李元昊称帝的时间长吗?他认为“夷狄”和“盗贼”都可以为正统,可见其反对封建正统史观之烈。

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抒发各自政治主张,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历史比喻现实,又以现实经验解说历史,写出了不少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史学论著。梁启超先后写了《赵武灵王传》《王荆公传》《管子传》,麦孟华写了《商鞅传》。为赵武灵王胡

服骑射叫好,为王安石变法“洗冤”,为商鞅变法“讼直”,为管子变法“传真”,以此抒发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抱负。革命派的一些杂志也发表不少有关历史人物的文章,如《湖北学生界》的《黄梨洲》、《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浙江潮》的《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江苏》的《郑成功传》、《为民流血史可法传》、《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复报》的《明季气节列传》,《新世界学报》的《宋爱国士岳文二公传》,《觉民》的《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中国大侠张之房传》,《竞业学报》的《岳飞传》,《政艺通报》的《黄梨洲先生传》等等。

在这些史学著作中,他们通过歌颂古代历史人物勇于反抗暴政和民族压迫的精神,服务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例如在对陈涉的评价问题上,刘师培在1904年《中国白话报》中发表《中国革命家陈涉传》,把陈涉与孔子并论,认为“如若没有孔子,就不能集学术大成,这教育就不能完全了。如若没有陈涉,就不能掀起革命风潮,这政治就不能改革了”。他宣称写《陈涉传》的目的就是要“教现在的中国人都晓得革命一件事在我们中国也是很多人实行的。就是独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国人创造出来的”。而“现在的中国,除得实行革命,没有第二个方法”^[4]。柳亚子则在《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中称陈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推倒政府,普救国民,留绝大纪念于吾祖国之大英雄大豪杰”,是“中国革命家第一人”,并表示无限崇拜^[5]。

在岳飞评价问题上,新旧史家尽管都是持肯定态度,但是肯定和颂扬之处具有很大不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在封建正统史家眼中,岳飞是忠臣和孝子的典范,其忠孝节义是岳飞最值得肯定之处,宣扬岳飞的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为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而新史家则侧重于对他抵御外族侵略的爱国精神进行讴歌,为宣传和发动民族革命服务。1903年《湖北学生界》在一篇文章中称岳飞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认为“今日者民族主义之风潮,日日刺激于吾国民脑中,岳王灵魂亦遂磅礴万丈之浩气”,“再苏于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之脑”,“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

民族之天神”。还认为后来之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人，都是“食岳王遗传之幸福者”，故“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金冠不得不敬上岳王”^[6]。《竞业旬报》1906年第5期发表的《中国民族排外第一伟人岳飞传》，也对岳飞抗击侵略进行称赞，将岳飞抗金与革命党人排满联系起来。同年，蒋智由也发表文章，对国内崇拜岳飞的心理进行分析，认为岳飞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所崇拜之一大人物”，就是岳飞代表了在南宋抗金形势严峻之时，忧国之士奋起抗敌，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的心理，认为崇拜岳飞这样的人物，“实能强固其国家，维持其种族，而为国民势力所由发展，事业所由建树”^[7]。可见新史家宣传岳飞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清朝统治，与封建正统史家完全不同。

重新评价郑成功的文章著作在这一时期数量也比较多。郑成功在明末长期从事抗清活动，并与投降清朝的其父郑芝龙毅然决裂，并且率领军队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盘踞的台湾。虽然清政府后来改变了对郑成功的评价，但在清朝有些官书中仍称其为“逆贼”、“海寇”。这一时期，郑成功坚持抗清和驱逐殖民者的事迹却得到了革命党人的高度赞赏。匪石1903年在《浙江潮》上发表《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同年柳亚子在《江苏》上发表《郑成功传》，都对郑成功的功绩予以肯定，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也高度评价了郑成功收复台湾。1904年《中国白话报》也发表了通俗白话文的《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以为宣传。革命党人热情称颂郑成功，希望用郑成功的事迹激励国民奋起投入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

黄宗羲不仅是卓越的学者和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且是坚持反清斗争的英雄。20世纪初年，新史家对其思想和事迹进行了重新评价和认识。他们将黄宗羲称为“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和中国的卢梭，视为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面传统旗帜，希望“中国民急奉先生书而读之，庶足于觉迷而争自由，以期耀国常于林林列国间”^[8]。1902年，《湖北学生界》发表题为《黄梨洲》的文章，称他为“纯粹的英雄”、“经师人师的英雄”、“张皇师说的英雄”、“举世

崇拜的英雄”等。同年，梁启超也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黄梨洲》，称黄宗羲为“中国之卢梭”，希望中国人民崇拜他，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必将赶上“十九世纪的欧洲”。

此外，这一时期的爱国学者还对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袁崇焕等人进行了重新研究与评价，发表了一些文章与著作。他们还宣传了一些对于中外交通和边疆安全的英雄人物如张骞、班超、郑和等，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民族女英雄的介绍与宣传，也占有重要地位。1904年创办于上海的《女子世界》杂志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英雄进行了详略不同的介绍；1906年上海广智书局发行的《祖国女界伟人传》，一共介绍了30多名著名女性，除了抗击外族的花木兰、梁红玉、秦良玉等人，还有西汉农民起义女领袖吕母、太平天国革命女英雄洪宣娇等。这些宣传介绍女界精英的作品，既与上述英雄人物宣传有一致之处，又进一步打破了传统以“节妇烈女”为主要内容的妇女宣传模式，也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重大批判。

其二，如何评价当代史人物特别是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的人物。

在鸦片战争以后，记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及其他农民起义经过的史学著作，有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陈庆年的《镇江剿平粤匪记》、李滨的《中兴别纪》等，还有王运的《湘军志》和王定安的《湘军记》等，都是以清朝为正统，在政治上仇视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起义，无一例外地将洪秀全等人称为“逆”、“寇”、“贼”、“匪”，对清政府镇压革命起义的“中兴之业”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则大加颂扬。对此，谭嗣同却不以为然，他对洪秀全等表示同情，对曾国藩等则很耻恶。他认为“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而曾国藩等“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他们却“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9]。

到了20世纪初年，新史家们进一步为太平天国运动及其领袖翻案，对洪秀全等人进行颂扬，而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所谓“中

兴名臣”进行鞭挞。1902年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即将洪秀全与秦皇、汉武以至于清朝皇帝并列，作为“考纪”之一^[10]。1902年至1904年间，刘成禺在孙中山的倡导和支持下，编写出版了《太平天国战史》。在该书中他为太平天国伸张正气，将饱受清政府和封建文人诋毁的洪秀全等人称为“反满英雄”，将颠倒的是非又颠倒过来。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曾国藩也，左宗棠也，李鸿章也，此大清皇帝所谥为文正、文襄、文忠者也，此当道名人所推尊为中兴三杰，此庸夫俗子所羨为封侯拜相，此科举后生所悬拟崇拜不置。”“而犹忍心害理，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之奴隶也如是，其他何足论。”“曾、左、李者，中国人为奴隶之代表也。”^[11]1906年，《民报》则刊登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的肖像，将洪秀全与孙中山并称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同年，留日学生编写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太平天国人物考》，共表彰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人物240人。

另外，梁启超等人还特别注意对当时在社会有很大影响的人物进行研究。在1901年先后写作了《李鸿章传》（又名《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南海康先生传》、《袁世凯之解剖》等，运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对他们的是非功过进行分析评价。

其三，如何评价先秦时期诸子思想及地位。

戊戌变法以后，诸子研究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在康有为提出的诸子平列的思想引导下，学者们依据自己的认识，参照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观点，对先秦诸子的本来面目、哲学特性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章太炎在《书》（增订本）中对先秦学术思想作了分析，对先秦诸子的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价。他提出要恢复被封建统治阶级极端推崇的孔子的本来面目，认为孔子不过是先秦诸子之一，“孔子闻望之过情”是从汉代开始的。在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中，他又进一步肯定了孔子保存文化典籍的功劳，既肯定孔子是“古良史”，对保存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又对其湛心荣利、惟在趋时提出了批评。另外，他还对道家、法家、墨家等代表人物作了符合资产阶级革命需

要的解释。章太炎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余杭章氏《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12]。刘师培等人也对诸子及其学说进行了研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和争论。

这一时期的人物研究,无论是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均比此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在一些方面如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人物研究及先秦诸子等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一时期的新史家的人物研究非常重视紧密结合社会现实,运用新思想、新方法进行研究,表现出相当大的生气和活力。但是,这一时期的人物研究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深入研究的成果不多,往往偏向于简单叙述和定性。另一方面,新史家在注重历史人物研究的“致用”价值的同时,往往不同程度忽视了“求真”,有时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不顾历史的是非标准,任意褒贬历史人物。如在《汉帜》上曾刊登了《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文中因改良与革命、保皇与反清的对立分歧,故提出要首先杀死“汉奸”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人,并将康熙平三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所用的汉臣都称为“汉奸”,显然存有偏激与错误。

二、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1919 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中国社会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过五四运动,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她以其坚定的革命性取代了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肩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经过近 30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变革带来了中国思想文化的

巨大变革和发展。由于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加剧,各党派团体的兴起,外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文化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多元化格局,这种文化状况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打上了特有的时代烙印。在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近代史学也呈现出各种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并起,各种论战此起彼伏的状况。这些史学思潮和流派在这30年中更迭频繁而迅速,有的通过自我否定而不断延续,逐渐形成一股盛大的史学思潮;有的则刚一流行即遭到分析批判而销声匿迹,或者被在性质上和面貌上大体相同的另一流派所代替。它们当中影响较大的有两大流派:一是从20世纪初继承过来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受新形势的影响和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它在20、30年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和繁荣。二是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了中国史学新的发展方向,在30年代文化争论后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在五四运动后的延续和发展,是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五四运动后,资产阶级新史学针对西方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等思想理论难于解决中国历史根本问题的现状,引进了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生态史观、帕格森的生命哲学等西方近200年以来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众流争渡、相互碰撞的局面,一如何炳松所言:“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生吞活剥之现象。……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诚不可谓吾国史学复兴之朕兆也。”^[13]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在接受了西方史学理论后,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历史开展新的研究,对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中影响较大的史学派别之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以解放思想、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为己任,以疑古相崇尚,对古籍和古事进行

辨伪。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就中国古史”的命题,认为传统的所谓中国古史,完全是后人一代代垒造起来的,并非客观真实的历史。他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14]。1926年,顾颉刚编辑出版了《古史辨》第1册,以后又陆续出版了6册,成为这30年间资料最丰富的考据学著作之一。这几期《古史辨》共收入文章350篇,从传说中的“禹”的存在,到孔子及其学说的地位、秦汉的统一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尽管顾颉刚等人在辨古史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大禹的是否存在的论述不尽科学,但是他们打破了古代黄金世界说,从根本上推翻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促使人们的思想解放,同时对上古至秦汉的人物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关于古史及人物研究的论辩。《古史辨》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争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钱玄同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等人对顾颉刚等人的研究表示了赞扬和支持,认为是“替中国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史学的中央题目”、“的确是个卓识”。而一些保守人士对其则深感不安,认为这些翻案文章“很是影响人心”,刘黎等在《学衡》等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它们“牵强附会”、“妄下断语”、“任情臆造”等等。就连王国维也说顾颉刚等“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而亦疑之”^[15]。足见其影响之大、论辩之烈。

此外,在这30年中,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著名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以及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在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各专门史领域内多有建树,在人物研究方面也不断突破和深化,进一步推翻了传统的封建观念。以梁启超为例,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所作的题为《屈原研究》的报告,对屈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评价。在他的影响下,国内出现了一个研究屈原的小热潮,又有一定数量的论文著作问世,在屈原的生卒年月、文学地位、政治属